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矜持态度 精致阅读

起点

QI DIAN



杜涌涛 主编

林天宏 著

为责任而执着 为梦想而倔强
中国近现代进程最勇敢的第一人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杜涌涛 主编
林天宏 著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起点 / 林天宏著.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1.9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丛书)

ISBN 978-7-5151-0090-6

I. ①起… II. ①林…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现代 IV. 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0126 号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丛书：起点

作 者	林天宏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话: 010-88624971	传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090-6	
定 价	25.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文化艺术 1

1. 朱启钤：“被抹掉的奠基人” 3
2. 夏瑞芳：温和的力量 6
3. 张石川：用胶片讲故事 9
4. 郑正秋：电影“伯乐” 12
5. 赵竹光：中国强健之象征 14
6. 郑文光：轮椅上的“预言家” 17
7. 钟敬文：耕作民俗园地的“农夫” 20
8. 易培基：守护故宫 22
9. 谭抒真：琴弦上的人生 25
10. 焦菊隐：艺术满分,政治20分 27

二、实业 31

1. 孙越崎：抗日战争里的“汽油桶” 33
2. 范旭东：倔强的抵抗 36
3. 穆藕初：实业界“一线光明” 40
4. 胡西园：照亮中国 42

5. 马应彪：贵乎诚实 44
6. 周祥生：从黑车司机到“出租车大王” 47
7. 项松茂：贪生怕死，算什么总经理 50
8. 唐廷枢：中国可无李鸿章，不可无唐廷枢 53
9. 吴羹梅：用铅笔抗日 55

三、科技 57

1. 汤飞凡：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59
2. 高鲁：让天文回归科学 62
3. 余青松：让天空记下中国人的名字 64
4. 张钰哲：“追星”60载 67
5. 陈遵妫：上知天文。不够！ 69
6. 蒋丙然：为天空涂抹理性光芒 72
7. 高平子：名字铭刻在月球上 75
8. 谢家荣：像矿脉一样被掩埋 78
9. 胡刚复：教给中国真正的物理 80
10. 胡明复：数学家的糊涂账 83
11. 徐寿：农具匠人推开科学大门 86
12. 谈家桢：有生物学的地方，就有谈家桢 88
13. 李复几：被掩埋的起点 91
14. 李善邦：为地震而生 94

15. A.W.葛利普：死后也要葬在中国	97
16. 裴文中：把75岁当做57岁	100
17. 贾兰坡：考古为了什么？	102
18. 华蘅芳：科技史上的第一颗星	105

四、教育 107

1. 郑锦：以美感育人	109
2. 胡敦复：破碎的“大同”梦	111
3. 陆礼华：欲强中华，先壮体质	114
4. 钟荣光：大学校长温而厉	116
5. 马君武：勇武校长	118
6. 胡元倓：叩头校长昂首拒官	121

五、职业 125

1. 杨秀琼：泳池内外的沉浮	127
2. 梁培基：愿为医学坐牢	130
3. 王助：凋落的机翼	132
4. 支秉渊：颠簸的车轮	134
5. 赵秉钧：成也警察，败也警察	136
6. 刘纪文：要拆先拆司令部	139
7. 潘序伦：从浪子到大师	142



8. 李忍涛：壮志未酬身先死 144
9. 冯如：为中国龙插上翅膀 146
10. 张瑞芬：闯入美军禁区的中国女人 148
11. 郑毓秀：以玫瑰为枪 151
12. 曹汝霖：民国第1号律师 154

六、新闻 157

1. 沙飞：新闻摄影不新闻 159
2. 冯有真：盛会中的孤独 164
3. 王韬：中国第一报人 166
4. 吕碧城：中国第一女报人 169
5. 英敛之：傲骨为大公 172
6. 沈荃：君死之日犹生之 174
7. 汪康年：为报而生为报而死 176

一、文化艺术Ⅱ

1. 朱启铃：“被抹掉的奠基人”

朱启铃（1872～1964年），字桂辛，贵州紫江人，著名实业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

6月13日下午，一场大雨过后，正阳门箭楼被带着水雾的脚手架包裹得严严实实。北京旧城中轴线上的这座标志性建筑，正经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

由正阳门箭楼北望，长安街车水马龙，它与城楼左右两侧的南北长街、南北池街，一同构成了北京旧城东西、南北走向的交通要道。

我问同行的一个记者：“你知道改造北京旧城，使其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第一人是谁？”

“梁思成？”她答道。

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却并不让人意外。随着北京旧城改造不断进入媒体视野，梁思成等一批建筑学家已被大众熟知。但少有人知晓的是，从1915年起，北京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市政工程建设，正阳门箭楼、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与南北池街，都是在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铃的主持之下改造与打通的。

同样少有人知晓的是，1925年，25岁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生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从国内寄来北宋匠人李诫撰写的《营造法式》一书，“兴趣大增”，由此走上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之路。1930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那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成为建筑学一代宗师。而《营造法式》一书的发现者，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正是朱启铃。

“朱启铃是中国古建筑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没有他，就不可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像梁思成这样的建筑学领军人物，我们读到《中国建筑史》的年份，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崔勇这样评价朱启铃。

崔勇的博士毕业论文，题为《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写于2000年。但他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除十多篇后人回忆外，再无与朱启铃相关的研究资料，“由于历史的原因，朱启铃被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者们有意无意地抹掉了。”

何为历史原因？崔勇并没有详谈。但翻开史册，却能惊奇地发现，在中国上个世纪前半叶的政局动荡中，朱启铃留下这些痕迹：北京巡警厅厅丞，北洋政府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后因因此被通缉），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

宦海沉浮，毁誉交织，朱启铃的身影，就在这一次次的身份更换中变得日益模糊。但依然清晰的，是他所创下的“累累实业”。

朱启铃督办修筑的津浦铁路，至今仍是我国最繁忙的铁路大动脉之一。他任董事长的中兴煤矿公司，是其时仅次于抚顺、开滦的全国第三大煤矿。他在上海创建的中兴轮船公司，是我国首家以民族资本兴办的远洋轮船公司，解放后成为新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基础力量……《华盛顿邮报》曾热情洋溢地赞道，朱启铃“成绩斐然，在远东罕有其匹！”

而在崔勇看来，朱启铃于1930年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更是将他的筹划与组织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朱启铃为学社请来当时最为优秀的学术精英：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

朱启铃还以其深厚的社会人脉，动员许多财界和政界人士加入学社，直接从经费上支持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

曾有建筑史家这样评价朱启铃：“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能把这方方面面的人事统筹起来，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朱启铃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个研究所行政部门做的事。”

梁思成晚年也曾回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治安很差，每次野

外勘测古建筑时，朱启钤均事先通过社员中的党政头面人物，向当地政府打招呼。每到一处，各县县长均亲自接待“一帮文弱书生”，并派员向导，必要时还派保安人员护送。

有数据显示，截至1937年，营造学社野外实地测绘重要古建筑达206组，因此“探索出一整套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科学方法，为撰写中国建筑史构建了扎实的科学体系”。

崔勇感慨，假若没有朱启钤，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又会是怎样的图景？

如今，斯人已逝，营造学社停办也已整整60周年。6月13日的那场大雨，将故宫端门外西朝房冲洗得干干净净。游人如织，屋宇间却依旧透着落寞，此处正是营造学社旧址。而位于东城区赵堂子胡同3号的朱启钤故居，住着数十户人家，杂乱之中，依稀可辨当年气魄。

2. 夏瑞芳：温和的力量

夏瑞芳（1871 ~ 1914 年），字粹芳，江苏春浦（今上海市）人，商务印书馆创办人。

一开始，这家名为“商务印书馆”的小印刷作坊，开在上海市江西路一个胡同里，在多如牛毛的印社中毫不起眼。

甚至，连它的创办者夏瑞芳也没什么文化。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原本在英文报纸《捷报》做排字工，因为受不了脾气暴躁的英国总编，一气之下约了几名工友，跑来自办印刷所。

1897 年 2 月 11 日开工的这家小印刷所，滋养了后来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人。不过当时，它还只有几台简陋的机器，承接的业务，也多半是招牌、票据、传单和教会图书之类。因为人手少，创办者夏瑞芳往往身兼数职，“总经理、校对、收账、买办、出店（供销）”，一个人都得做。

这是这个出生在帮佣家庭的小人物所干过的最体面的工作。他没读过多少书，以前的工作是医院护理，或者巡捕等。此后几十年中，他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家小小印刷所的命运。

第一次大的成功出现于创办的第二年。对英文一窍不通的夏瑞芳觉得，在华洋杂处的上海滩，人们对于掌握英语有着巨大的需求，便出版了商务的第一本书——《华英初阶》。这本汉英对照的教科书非常畅销，一版再版，成为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大的成功。

1902 年，夏瑞芳决定聘请张元济入馆。此时，张元济在南洋公学郁郁不得志，月薪是 100 大洋，而夏瑞芳给他开的薪水是 350 元，翻了三倍有余。

两人合作的 12 年间，夏瑞芳放手让张元济主持馆务，听任他聘用人才、施展抱负。这位温和的老板，对张元济随后延揽的人才，都尊称为“老夫子”，还让工友们称这些文化人为“师爷”。而编辑部的采编人员除月薪外，还供给膳宿，甚至“茶叶、水烟”。

当时，商务印书馆一位普通编辑沈知方，经常不按时上班，同事和股东背后议论纷纷，但夏瑞芳却为沈辩护，说他“才气宏阔”，一旦让他离去，日后必将成为商务之患。夏瑞芳的预言不知方幸成真。1912年，中华书局创办成立，翌年，沈知方就被中华书局“挖了墙脚”，委之以副局长的重要职务，并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成了商务印书馆的劲敌。

在商务印书馆早期，馆内集中了近代中国的一大批文化精英。不过，这些一向清高孤傲的文化人，在夏老板高明的调节手段下，却不曾闹出什么大乱子。

在1914年夏瑞芳离世之前，夏瑞芳作为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张元济做编译所长，主掌书刊出版，两人的合作，被称为“绝配”。对于张元济的要求，夏瑞芳几乎言听计从。1905年，江南著名藏书楼“百百宋楼”的宋版藏书欲出售，张元济担心国宝外流，心急如焚，夏瑞芳竟然在公司仅有的10万元流动资金中“慨然许以八万元”，支持张元济竞购。

在两人共同确定的“开发民智、提高民众文化素质”的出版方针下，商务印书馆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以出版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等学术名著为发端，把西方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介绍到中国，在近现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有一组数字为证：清朝末年，全国图书的营业额每年约为400多万银元，其中商务印书馆约为150万银元，占1/3，而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占2/5。

一名研究商务印书馆的专家评论道：“（它）成为解放前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不能不归功于夏瑞芳，他为商务成为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这位专家的眼中，仔细分析夏瑞芳成功的原因，除了个人性格因素外，自由竞争则是其最主要的因素。“今天的中国出版界，有这样那样的限制，抬高了进入文化领域做生意的门槛，人为制造了不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我们不妨总结一下中国文化史，像夏瑞芳这样的小人物，为什么能够做成今天那些顶级文化人都没能做成的文化大生意？”

也有人认为，在夏瑞芳的温和外表下，隐藏着某种力量。作家包天笑曾回忆，“戊戌六君子”死后，日本横滨印了谭嗣同《仁学》一书，留学日本的朋友寄给包天笑五本。他想翻印这本禁书，于是找到夏瑞芳，夏满口应承，还说：“没有关系，我们在租界里，不怕清廷。”

3. 张石川：用胶片讲故事

张石川（1890～1954年），原名张伟通，字蚀川，后改为石川，浙江宁波人，导演，中国电影事业先驱，中国第一个现代电影公司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把名字“蚀川”改为“石川”，对于张石川——这家刚创办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来说，更多是为了讨个“彩头”。他未必能料到，自己将在中国电影史上开创出一番怎样的事业。

尽管早在1905年，中国人已经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但十多年过去，这个国度的人们对于电影的理解，还停留在这样一种层面上——摄影机是不移动的，演员做起戏来，哭哭笑笑，跑跑跳跳，一直到摄影机里的胶片用完，停下来换上胶片，再接着来。

就连“导演”这样一个概念，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里也并不存在。直到一部叫做《难夫难妻》的电影出现——这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导演”这个职业的重要性才开始显露，并逐渐取代了摄影机的角色，成为电影的操控者。这部电影的导演，便是张石川。

从16岁那年来到上海滩，在舅父的房地产公司担任小职员开始，这个“方面大耳，声若洪钟”的宁波人，就开始显露出他性格中“不安分”的一面。一个偶然的机，接触到电影这个行当后，他便开始做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事”。

他发明了拍电影的新方法：编剧郑正秋教演员做动作，他指挥摄影师选择机位。这便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导演”工作，这种创作思路，也成为此后中国电影创作的基本内涵。

用“讲故事”的方式，张石川拍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部反帝片《黑籍冤魂》、第一部劳工片《劳工之爱情》、第一部体育片《二对一》……

三十多年间，张石川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他总共拍摄了156部电影，几乎每一部都很受好评，每一部都有艺术及技术上的创新，每一部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在他的影片里担当过角色的演员，后来许多都成了名噪一时的大腕儿。

1928年，张石川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刚上映即引发轰动。当时的报纸用“争先恐后”、“誉满东方”、“人人欢迎”等语言来称颂这部影片。随后，这部电影连拍了18部，中国电影也就此开创了一个武侠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武侠成了中国电影的“常用兵器”，也成为走出国门、能够与世界对话的标志性类型片。

但少有人知的是，这部电影的灵感却来自张家的厕所。有一次，张石川随手拿着一本《江湖奇侠传》坐在马桶上解闷，忽然灵机一动，觉得此书搬上银幕一定能叫座儿。可当时，中国电影界还从来没拍过武侠片，即便明星公司内部，也有声音，认为这种片子“下里巴人”，观众不会喜欢。

据说当时，“听总经理说书”，成了明星公司里独特的风景。每天开拍前，演员们就聚在一起听张讲故事，然后开拍。张口才极好，“想让演员笑就能让演员忍不住笑，想让演员哭就能让演员好像死了老子娘。”

张石川讲的故事，许多都不是胡编乱造，而是来自生活。张的岳父好佛，家中常有和尚出入，他便与和尚们交上了朋友，听完庙里的故事，再用到拍戏上。也难怪有同事这样评价：“只有总经理一个人知道后面的情节是怎样的，如果他出门被汽车放倒，那这碗饭大家就都不要吃了。”

作为明星的总经理，张石川给员工们灌输的是这样的理念：“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投资电影，他并不冒险。鸳鸯蝴蝶派影片赚钱，他就拍鸳鸯片；武打片卖座，他就拍武打片；左翼电影兴起，他也拍；而当国民党“剿共”，为了配合，他也会拍上一部。

但他也有不考虑这些的时候。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与日军鏖战，这个电影公司老板决定亲自出马，赴前线拍摄。